



精神生活

知行论坛

全球视野下儒学的当代价值与未来展望

——第二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的探索

儒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儒学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实践中,儒学形成了许多富有哲理的深邃思想,发挥了广泛而显著的社会功能,对中华民族、东亚乃至整个人类的进步与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当今时代,作为人类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儒学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就此问题,与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仁指出,儒学所彰显的“天下为公”的人文之道,所崇尚的明道救世的价值取向,积淀着人类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指导意义。结合中韩两国历史与现实的发展来研究儒学,不仅能够揭示儒学所发挥的具体社会作用,而且能够针对全球化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探寻出儒学的现实价值。山东大学社会科学党委书记唐洲雁指出,两千多年来,儒学由邹鲁之地走向中华大地,又由中国走向东亚,由东亚走向世界,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治国理政、道德建设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对道德完善和社会进步的精神追求和理性探索,对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难题,有着重要而深刻的现实启示。探讨儒学的当代价值,应从不同的国情出发,研究儒学的历史作用,探讨儒学的转换和发展,加强儒学研究的交流。山东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张述存认为,儒家思想在古代社会对韩国文化传统的发生、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也对当今社会有着重要影响。在加大中韩两国经济交往的同时,全方位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特别是加强儒学研究,实现儒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发挥儒家优秀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引领作用,教化作用、凝聚作用和导向作用,对韩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总领事李寿尊认为,历史上,儒学在韩两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韩国之所以在产业发展上取得复兴之韩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因为深入韩国国民日常生活的儒家精神所缔造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天,中韩两国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应进一步提高合作层次,开展包括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在内的全方位合作。中韩两国关系应在两国人民共同拥有的儒学精神价值的基础上,共同深化发展。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今中国的热点话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卫平对历史上儒学在建构和培育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至少有三点历史经验值得参考和借鉴:第一,理论上,核心价值观既要有不同层面,又要有贯彻不同层面的本体依据。儒家“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即包含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内容,而这三个层面作为有机的整体,最后皆归于“仁”。第二,制度上,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有赖于制度化的建构。历史上,儒学价值观作为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即是通过确立礼仪制度来实现的。第三,文化上,要围绕核心价值观建构一套合适的话语体系。清代《四库全书》作为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构建颇具代表性,即坚守基本价值和多元包容相结合,坚守基本价值和对接历史相结合,坚守基本价值和艺术形象相结合。

儒学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现实文化语境,当前我们面临的时代问题在于如何现实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三者之间的相互融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从知识与思想两个维度给出建议。他认为,从知识的视野说,中、西、马之间相互吸收、又各自发展。就思想的视野说,分别有三个内容,即“新仁学”,自由意志和社会“实践”观念。“新仁学”是以传统的“仁学”思想为依托,吸收现代西方的人学思想内容,而形成的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仁学思想;承认自由意志,则是现代

201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韩国期间,与韩国总统朴槿惠达成共识,双方共同商定努力将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机制打造成为加强两国人文纽带的重要平台,并对外发布了《2014年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交流合作项目名录》。其中,“中韩儒学交流大会”是合作项目之一。为落实中韩两国元首就人文交流达成的共识,中国外交部将“中韩儒学交流大会”的中方事宜交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山东省人民政府指定山东社会科学院具体承办;韩国外交部将“中韩儒学交流大会”的韩方事宜交由驻青岛总领事馆负责,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具体承办。在中韩双方的共同努力下,2014年8月,首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取得很好的社会反响。同时,山东社会科学院和韩国国立安东大学还分别成立了“中韩儒家文化研究中心”和“中韩儒教文化研究中心”。2015年,中韩儒学交流大会再次被列为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交流合作项目之一。8月17日,由山东社会科学院、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孔子研究院、韩国国立安东大学、韩国国学院、韩国国学院、韩国国学院共同主办,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共同承办的第二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孔子研究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以及韩国国立安东大学、韩国国学院、韩国国学院、韩国国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多位儒学研究专家学者,围绕“中韩儒学比较与发展”的主题,就儒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现代意义、儒家思想与道德建设、儒学在东亚的传播、儒学的未来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探讨。

西方文化贡献于人类的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也是现代伦理学、法哲学的思想原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概念不仅在地包含传统文化道德实践的内容,而且远比道德实践的内在丰富得多。两种“实践”观念交融在一起,可以丰富我们对社会“实践”观念的理解,进而也为思想的创新、创造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更加丰富的生活资源。针对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认为,儒学本源地蕴含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更是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正当原则和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即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决定了儒学本身就是一个活的、开放的体系,本身就具有自我更新的机能。就儒学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北京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李翔海认为,儒学是形成东亚现代化道路特质的主要原因。儒学不仅可以提供不同于基督文化的精神动力,而且在维持社会的持续发展、保持社会横向关系的和谐平衡以及在微观经济管理方面,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思想资源。

当下的儒家文化复兴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洪星认为,“儒家文化的复兴”必须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全球化”既可以理解为一种事实,也应该理解为一种精神。“复兴”传统文化要在“全球化”的架构和视野下对此传统文化的价值作一切己的自我认识。对于传统(儒家)文化而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惟其认识自己,克服自己,才能超越自己,以获得新的生命活力。针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韩国安东大学教授尹根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动物,人失去了其应有的幸福和满足。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并非是人类选择的最终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有必要接受儒家传统的调整,让人类在追求内在而不是外在价值的过程中获得那份属于人的愉悦和富足。在展望人类未来的时候,把生活从资本主义利益博弈的战场中抽出来,让儒学进入我们的生活,用儒家人性化的道德文化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

道德建设与治国理政,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话语讲就是内圣与外王。如何重新解释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如何重新解释内圣、发展外王?山东大学社会科学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石永之认为,传统的内圣外王应用于皇权时代的家族社会,当今时代,民权取代皇权,家族日益消亡,应以家庭伦理和规则伦理取代家族伦理,并以新儒学补救信仰缺失之弊端,此为儒家新内圣。新外王的民主政治以仁爱共议为基础,首先是天下主义,其次是平等自由主义。儒家内圣外王的新连接应该回到儒家的源头活水处,合孟荀,折

衷于孔子,其思想结构就是:仁爱、平等、自由。与石永之对内圣与外王全盘照搬,又全部重新解释有所不同,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研究员路德斌认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并非只是一种政治的理想与设计,在过去的夏、商、周时期,尤其在有信史可据的周朝,作为一种治道模式,它确实切实在现实政治中运作过,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过。这也是孔、孟儒家对“内圣外王”之道崇信不疑的根据。而按照荀子的思考,在国家治理层面,治道的根本只有一个,那就是“礼义法度”。但在中国的基层社会,“内圣外王”依然切实有效,这种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针对儒家治国理政思想中法治和德治的关系问题,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指出,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道”是最高的价值诉求,“德”则是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而就治国理政来说,德法并用,德法统一,是儒学一贯的治道理念。“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治国如御马,御马必有衔勒,治国必以德法。

韩国忠南大学教授李镇卿指出,儒家思想作为政治原理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主导东亚的社会和历史,主要原因就在于儒家的治道理念是一个开放的、二元互补的结构。道德与功利、德礼与法刑、君权与臣权等等,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既是稳定的,又有与时俱进的灵活性。这对于现代社会治国理政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学术界近年来对儒家正义论的关注和研究掀起了韩国儒学的共鸣和回应。韩国弘益大学教授朴奎奎特别研究了孔子的正名思想。他指出,“正符合事实之名”是孔子正名论的第一要义,这就是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A有A的样子,这表明,“正义”这个词只有针对名副其实的事情才能说是正义的。无道的社会总是根据权力和金钱随意定名,这必然名不副实,这样的社会就会混乱。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韩国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专任研究员李承模通过自己对“正义”观念的考察以及东西方正义观的比较,指出儒家以“仁”为人之安宅,以“义”为人之正路的正义观与西方传统的正义观不同。如果说西方的“正义”是以“我”为中心,那么孔子的“正义”就是以“我们”也即以“人类”为中心。只有以“人类”为中心、珍视人类生命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社会。学者们就儒家思想与当今社会道德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孙聚友认为,基于儒家思想对人的存在完善的认识出发,以“和而不同”为基本原则,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本原则,的儒家和谐观,是和谐社会秩序建构,和谐经济关系确立,和谐身心关系实现的重要指导原则和实践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温海明认为,孟子心性论在儒家发展的大多数时期是,今天仍然是把古老的儒家地域性伦理发展成为全球性伦理的根本缘发动力,但有必要对孟子心性论做当代哲学与宗教性的双重建构。在哲学上,孟子的心性论需要从一个动态的缘发关系状态加以重构,从而能够立足当代儒家

社会现实与西方哲学对话;在宗教上,孟子心性的宗教性深度和广度需要在西方宗教性维度的对照下得到确定,从而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宗教性重构当中成为根本性的宗教精神原点。这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通过哲学与宗教性的双重建构,儒家的修身养性思想是将儒家地域性传统伦理发展成为具有全球伦理意义的重要动力资源。在近代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共同体主义(或者叫社群主义)是在批判个人主义的极端唯我论的情况下出现的,但对于什么是共同体,西方学界内部存在分歧,东西方学界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差异更大。韩国学者在交流中对东西方“共同体”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韩国国学院首席研究委员金钟锡认为,把儒学思想原原本本地照搬到现代是不可行的。在现代社会,儒学之所以被重视,之所以仍然被反复讨论,是因为共同体的问题——如何共同生活,这是人类始终要面对和处理的重要问题,而“共同体”论正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和价值所在。儒学的“共同体”思想可以表述为“为道德原理的自我献身”。他通过对张载《西铭》以及李退溪《西铭考证讲义》两个文本中所蕴含的儒家“共同体”思想的诠释,指出儒家思想为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套本体层面的基本原理和实践层面的关系原则,这是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重要贡献。韩国国学院首席研究委员李尚信小见大,通过对《丰》卦详细而具体的研究,提出《丰》卦的主题是讲明德之丰,爻辞围绕明德之丰而展开,明德有被遮蔽的时候,当明德被遮蔽后,其丰大之明德有一个从被遮蔽到重新显现的过程。古人倡导的是明德之丰大,而不是物质享受的奢侈或丰大。《周易》古经很可能就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部明确谈到去蔽的著作,荀子的去蔽思想无疑是在《周易》古经去蔽思想的深化与发展。《丰》卦讲明德与《大学》的明明德有显而易见的联系,而《丰》卦讲明德被遮蔽而不是完全消失,此一理路为《中庸》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而开显出中国哲人性论的已发和未发、已显和未显的重要和基本理论。

李退溪是韩国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中韩两国学者有多篇论文论及李退溪先生的性理思想。就《易》经与韩国大儒李退溪思想之间的关系,中国孔子基金会教授彭彦华认为,李退溪《易》讲《易》述《易》,完全是为了进修践履。李退溪既继承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他认为《易》乃理数渊源之书。李退溪对《周易》的时中之义体悟甚为精到,而且身体力行。他主张礼有因革损益,有常有变,礼在生活实践中应当从俗、从宜、从权,其基点是“缘仁情”。综上所述,儒家思想蕴含着人类达于至善的丰厚滋养,需要人们以笃守善道的历史责任感和执道弘毅的现实使命感,深入研究和努力弘扬儒家思想,推动儒家思想的国际研究和创新发展。今天的人们既享受着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种种便利,又承受着与之相伴的种种艰苦与磨难,儒学也许可以为克服这些艰苦与磨难提供有益的帮助。可以说,第二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的召开是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也是顺应时势人心的举措,既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又极大地推动了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进一步走向深远未来。(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

石永之 孙聚友

反思与澄明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

找回并唤醒我们自身的“活”的文化传统

发掘和拓展精神生活的新文明意义

精神生活的当代建构,需要深刻的文化自觉。只有栖居于自身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才能拥有心有所属、魂有所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获得走向未来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力量。

到哪里去寻找我们的文化传统?在现代性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文化传统不仅要经历过渡、选择和变迁,还要面临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内部资源流失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的挑战。我们固然能够从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发现传统的存在,但真正的传统作为活的精神,已融化浸润于人们朴素自然的日常生活、心灵结构与精神世界中。人与人的相感相应,人与物的相融相通,身与心的相契相合,群与己的相属相亲,如此等等,已构成中国人真诚为人、仁义做事、和美生活的存在之道。以中国文化传统的观点来看,精神生活既不是要遁入和执迷于神秘主义的彼岸世界,也不能停留和下降为个体自我的感性表达。与西方文化把人的精神生活引向外在超越的彼岸世界不同,中国人提升精神生活的形式,主要在宗教之外,在不离日用常行的道德修养和生活实践中。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的精神生活是内在超越的,它以诚意正心、明心见性作为基本起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体现出崇尚尚德、修身养性、慎终追远、和乐自在、文明以止的精神特质。天人合一的信念追求,返本内求的精神修养、仁义担当的思想情怀、知行合一的价值旨趣,文明天下的生活理想,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固有的底色和生生不已的精神实践。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心、理、气于一身的精神意蕴,合儒、释、道为一体的精神结构,融心性觉悟、伦理体认、修养实践为一脉的精神要求,蕴含着现时代精神生活所需要的文化元素和文明精神。在当代条件下,这些文化传统都需要被重新激活和唤醒,以作为我们重构时代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底蘊和基础。

当代中国既处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上,又处于东方与西方的结合点上。在现代性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的心灵历经着物质与精神的张力失衡,传统与现代的叠加冲突,高雅与庸俗的纠结错位,希望与失望的精神落差。时代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应当有着自己独特的坚守,也理应敞开向未来和面向未来的文明胸襟,应当把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世界在更高层次上协调统一起来,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 and 时代气息的新文明样式。如何赋予我们的精神生活以新文明的意义,需要我们加以体认和领会。

归根到底,精神生活引导着人们对于好生活的希望、企盼和追求,负载着人们对于生活意义的理解和理想生活的想象。它内在地要求精神自觉地、从理性的需要和自我的天地中提升出来,获得文化的意蕴和文明的品格。在我们的理解、想象和期待中,当代精神生活的建构,需要在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互动中,敞开一种能够引导新的文明形态的精神生活。在此意义上,塑造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夯实社会共享的精神基础,培育平和从容的心理生活;创造书香社会的文化氛围,以文化的滋养来浸润和提升我们的精神品质,追求诗意栖居的文化生活;提升自我的人格修养,在经验与超验、世俗与神圣的连接处获得内在超越的终极关怀,实现心有所依的心灵生活。这是我们这一时代精神生活应有的文化自觉和文明自信。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实现中国梦研究》[14ZDA009]的阶段性成果)

如今,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迫切。那么,如何追求更有品质、更有意义和更加文明的精神生活?如何理性引导人们从意义的浮泛无根和兴趣的浅薄无聊中超拔出来?如何促使我们这一时代精神生活的文化自觉和文明自信?这些问题已成为既关乎大众日常生活,又关乎民族精神成熟的焦点话题。

精神生活是人在精神层面上为自身存在注入意义感、归属感的生命活动,它包含和负载着人对生活意义的情感体验、理性自觉、价值认同与精神归属。在一定意义上,精神生活规定和表征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素养、文化境界乃至历史命运,从根本上体现着一个民族对自身生存发展的认识和理解所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文化自觉和精神成熟的水准。

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扩张,一方面敞开了人的社会交往和精神生活的可能性空间,另一方面又使精神和文化被卷入利益最大化的冲击之中;现代科技的发展,既为精神需要的满足提供了发达的物质基础和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又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以及精神生活的物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在使我们的精神生活获得感性丰富性和暂时性满足的同时,又导致了市场化、媚俗化、粗鄙化现象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借助于大众传媒和网络世界,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从诉诸文字到诉诸影像,从愉悦心灵到刺激感官,从理性反思到情绪宣泄,精神生活的文化表达越发呈现碎片化、感性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的倾向,我们的精神越来越缺少专注、缺少深入。更让人忧虑的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组,使个体自我在获得“解放”的同时,又陷入到“被抛”的状态,人们之间的情感和关系也容易随着流动性而变得日益淡漠。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以及社会转型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也加剧了个体对传统的质疑,从而使公共核心价值的建构、意识形态的认同和社会多元文化的整合面临窘境,作为终极价值的信念信仰也由此遭遇危机。如何拥有内在超越、平和从容、优雅文明的精神生活,已成为当今时代亟需解决的思想任务。

精神生活的当代建构,需要深刻的文化自觉。只有栖居于自身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才能拥有心有所属、魂有所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获得走向未来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力量。

到哪里去寻找我们的文化传统?在现代性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文化传统不仅要经历过渡、选择和变迁,还要面临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内部资源流失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的挑战。我们固然能够从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发现传统的存在,但真正的传统作为活的精神,已融化浸润于人们朴素自然的日常生活、心灵结构与精神世界中。人与人的相感相应,人与物的相融相通,身与心的相契相合,群与己的相属相亲,如此等等,已构成中国人真诚为人、仁义做事、和美生活的存在之道。以中国文化传统的观点来看,精神生活既不是要遁入和执迷于神秘主义的彼岸世界,也不能停留和下降为个体自我的感性表达。与西方文化把人的精神生活引向外在超越的彼岸世界不同,中国人提升精神生活的形式,主要在宗教之外,在不离日用常行的道德修养和生活实践中。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的精神生活是内在超越的,它以诚意正心、明心见性作为基本起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体现出崇尚尚德、修身养性、慎终追远、和乐自在、文明以止的精神特质。天人合一的信念追求,返本内求的精神修养、仁义担当的思想情怀、知行合一的价值旨趣,文明天下的生活理想,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固有的底色和生生不已的精神实践。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心、理、气于一身的精神意蕴,合儒、释、道为一体的精神结构,融心性觉悟、伦理体认、修养实践为一脉的精神要求,蕴含着现时代精神生活所需要的文化元素和文明精神。在当代条件下,这些文化传统都需要被重新激活和唤醒,以作为我们重构时代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底蘊和基础。

找回并唤醒我们自身的“活”的文化传统

发掘和拓展精神生活的新文明意义

